

内部材料

注意保管

# “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选辑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印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选辑

71.71.11.0

党史教研室编

## 说 明

为了配合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选编了这本册子。其中有中共中央党校一九八四年党史师资进修班讲课记录整理稿，仅供参考；同时选载了部分报刊文章，以便同志们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几件大事有个概括的了解。但由于时间匆促，选编工作中难免有缺点和问题，希同志们批评指正。

本书系内部发行，请勿翻印，引用。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一九八四年九月

# 目 录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必须彻底否定·····	( 1 )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	( 6 )
上海“一月夺权”和“二月抗争”·····	( 76 )
“二月逆流”始末记·····	( 99 )
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	( 132 )
关于刘少奇同志的问题·····	( 152 )
党和人民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 160 )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出现和覆灭·····	( 169 )
“九·一三”事件始末记·····	( 194 )
林彪反革命政变破产记·····	( 238 )
“联合舰队”的覆没·····	( 251 )
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几个问题·····	( 275 )
叶帅在时代激流中·····	( 288 )
“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解答·····	( 293 )
几个小资料·····	( 306 )

#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必须彻底否定

谭宗级

列宁在论述政治错误与理论错误的关系时曾强调指出：“如果一个人从他自觉运用的一定原理出发犯了错误，那未不找出他犯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无法完全弄清他的任何错误，包括政治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第四四九页）。同样，要完全弄清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错误，也必须找出它的理论根源，这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这一理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从原则上作了批判，指出它明显地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但这一错误理论的影响是既深且广的，至今存在的一些“左”的思想和糊涂观念都和它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必须进一步从理论上清算它的错误。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它作为一个确定的概念加以系统地论述，首见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为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而发表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这篇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归纳为六个“要点”，这也可以说是“左”倾错误理论的一个概括，以后它又被写入了党的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载入了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一度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其主要论点是：

一、认定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前提。

二、认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这是因为随着社会上阶级斗争日益激烈，“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心任务不应放在发展生产力上面，而应该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把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

三、认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采取的方法，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通过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政治斗争，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党和国家的阴暗面。这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形式。

这个理论曾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其实恰恰相反，这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贡献和发展，而是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首先，它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概念是很明确的，它是指两种对立社会形态之间的过渡，即指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向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列宁把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区分为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三个阶段。这三个不同发展阶段都有其特殊性。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社会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征，不能相提并论。在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主要是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并存，与这些经济成分相适应，存在着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选集》第四卷第八十四页）。一旦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从存在剥削阶级转入消灭剥削阶级时，过渡时期即告终结，从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尽管还存在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这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但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已归于消灭，阶级矛盾已不是主要矛盾，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的总趋势将会逐渐减弱直至最后消灭。正如列宁多次强调指出的：“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列宁选集》第四卷第八十九页）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无异于说，这个社会永远不能消灭阶级，也就无异于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这种论断的完全不合事实，完全不合逻辑，并且完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显而易见的。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是这样抹煞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同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时期的原则区别，把它们混为一谈，笼统算之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并始终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认定这两个时期存在同一性质的矛盾，受同一规律的支配。很明显，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列宁说得好：“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清楚地知道，他们是把还有阶级的时期和已经没有阶级的时期非常严格地区别开来的。”（《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二百三十七页）具体地说，过渡时期是无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着手消灭剥削制度、消灭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的时期，因而也是进行激烈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时期。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这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时期，则是在消灭剥削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这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如果把大量的反映过渡时期的矛盾的论断，诸如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小生产每日每时不断产生资产阶级等等，统统搬到社会主义

社会，作为发动一次比一次激烈的政治运动的理论依据，那就南辕北辙，根本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其次，它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根本任务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二百七十二页）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及其任务的经典论述。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变成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列宁明确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五百〇九页）。列宁不仅主张把提高劳动生产率放在党的工作的“首要地位”，而且反复强调要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去，提出“夺取了俄国”以后，应当“管理俄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四百九十六页）。但是，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中断了列宁计划的实现。当打退外国武装干涉、结束国内战争后，列宁立即适时指出：“经济任务、经济战线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任务和基本的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重申要“把全部注意力转到这种经济建设上去”，（《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百八十一—三百八十一页）确定组织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代初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由此可见，各国无产阶级革命都需要解决以下三个基本问题：一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二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三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尤其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和职能，就是组织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繁荣和提高社会主义文化。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与此相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却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组织与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至关重要的任务，反而大批特批所谓“唯生产力论”、“用生产压革命”等等，致使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破坏，工作重心长期不能转移到四化建设的正确轨道上来。很明显，这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基本任务的学说背道而驰的。

再次，它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论。“革命”一词，具有多种涵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革命的本义是指政治革命，即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全面历史变革。早在一八四四年马克思就指出：“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是政治行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集卷第四百八十八页）这里所说的“一般的革命”就是指革命的本义而言。在《哲学的穷困》一书中，马克思进一步论证了这种革命发生的条件、内容和方法，他说：“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

治·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一百九十八页)列宁也对革命的本义作了具体阐述,他说:“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二十五页)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政治革命,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胜利具有决定的意义。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曾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不断革命思想,宣传“不断革命”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这就是说,只要有产阶级还占据统治地位,只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未建立,这一革命就要不间断地进行下去,不能中止。“不断革命”作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具体是指无产阶级在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后,不能将革命停顿下来,应当紧接着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认为,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一座万里长城挡住,他明确指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二百二十一页)。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错误地认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并把它看作是剥削阶级消灭以前的政治革命的继续。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发展阶段是各不相同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仅仅是无产阶级推翻剥削阶级统治这一阶段的任务,在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政治革命通常采取的形式就有本质的不同。以前的革命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而以后的革命将不再是政治革命。在我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就根本不存在进行政治革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取代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占据主导地位;在政治上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复存在的时候,阶级对抗也就随之消灭。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应该再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混淆了不同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内容和任务,在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完成以后,还去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其结果不仅没有使“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反而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使“天下大乱”持续了十年之久,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当然,我们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这绝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特别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获得彻底解决,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要通过社会主义的实践变成现实,都要求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改革。从解放生产力、把社会推进到共产主义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也可以说是革命。但进行这样的革命不仅在内容上同过去的政治革命有根本的区别,而且所采取的方法也根本不同,这应当是很清楚的。

如上所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错误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它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革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毫无革命性和进步性可言。错误的理论产生错误的实践。“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所谓“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党内有特权阶级”、“走资派在党内”那

套东西，就是这一错误理论的具体表现。它的流毒应当说还没有完全肃清，在有些人的身上还不同程度地发生影响。因此，在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中，进一步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剖析，克服人们的一些错误认识和言行，是十分必要的。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八四年第二十一期）



# 关于几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中共中央党校 党史教研室 谭宗级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决议》第五部分已作了全面论述，这是胡乔木同志亲自起草、修改定稿的。从十九条至二十四条，约六千六百字，可以说是言简意深，值得我们很好地钻研领会。这部分六节，讲了五个问题。

第一、关于“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性质。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第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过程和发展阶段。决议是分三个阶段，作了扼要的叙述和评价。①“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一九六六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为起点，至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为第一阶段，或叫前期。中心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全国大动乱。②从党的“九大”到党的“十大”为第二阶段，或叫中期。中心问题是林彪集团抢班夺权，策动反革命政变和政变被粉碎。③从党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是第三阶段，或叫后期。中心问题是“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搞阴谋夺权，至十月的历史性胜利，就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时期。

第三、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说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第四、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艰难曲折的斗争。

第五、“文化大革命”延续十年之久的原因。

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共讲了这五个问题，限于时间，我不全讲，这次只讲“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

## 一、“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全面发动

### （一）“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生的呢？决议第18条最后一段话作了概括：“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

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段话用简洁明晰的语言，概述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归纳起来，这段话有三层意思：①思想理论上的失误。理论上的失误是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②组织原则的破坏，即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从而个人专断形成。③坏人的破坏和捣乱。现在根据这三点进行分析。

1、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理论日益发展。同志们学决议时，我建议大家看一下《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收入的邓小平同志对决议的起草意见。邓小平同志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对的，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这就是说，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开始转向错误。

一九五七年是国际国内大动乱的一年。国际上波、匈事件的发生。国内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对右派的进攻，一方面是要反击，但另一方面扩大化了，反右错就错在扩大化了。刚开始时，有些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用文学语言讲本来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毛泽东同志后来把这种形势估计为“黑云压城城欲摧”（一九五七年七月一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引李贺的诗），把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了。反右派斗争的消极后果是毛泽东同志开始在理论上偏离了原来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分析。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二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89页），今后我们的根本任务是要“向自然界开战”，（同上书375页）向地球开战，已“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同上书377页）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到六月十九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报上正式发表时，加了一段话：“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同上书389页）又回到阶级斗争上来。加的这一段话，原稿是没有的，原来是讲要搞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力，不是讲要搞阶级斗争。从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左”倾错误的论点：

第一、改变了“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本来“八大”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分析，对阶级斗争的估计是对的，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基本被消灭了。而毛泽东同志重新说资产阶级还存在，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仍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75页）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的，改变了“八大”对主要矛盾的看法，认为“八大”的看法不对。断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进一步提出，只是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不够，还要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些观点很明显地背离了“八大”的正确结论。

第二、一九五八年提出我国还有“两个剥削阶级”。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以后写进了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一九五八年五月）。这个报告是刘少奇作的，但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加上去的。“两个剥削阶级”，是指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它反

动派；正在逐步接受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这就把知识分子升格了，作为剥削阶级看待。很明显，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消灭以后，还认为有剥削阶级存在。这是不对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里讲什么叫阶级，是很清楚的。阶级是按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占有多少，自己是否劳动，有无剥削，是按这些来划分的。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这样讲，当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把知识分子列入剥削阶级范畴更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认为知识分子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左传》上的两句话，这两句话本来是形容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毛泽东同志把知识分子看成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梁山君子”。（毛选五卷487页）

人们进一步问，为何反右斗争后会使得毛泽东同志在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上发生偏差？这可从三方面分析：①社会主义本身是新生事物，它本身还在实践中，人们对它的认识不是笔直平坦的，不是一次完成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进行直接产品分配，不要商品和货币。列宁在十月革命初期搞战时共产主义，实践行不通，就搞新经济政策。一九三六年斯大林宪法颁布时，苏联基本上是国家工业化了。这时斯大林遇到了反对派的反对，他简单的认为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结果搞了个肃反扩大化。斯大林的接班人基洛夫被刺，这件事对斯大林震动很大。我们一九五七年的情况与一九三六年的苏联有点类似。本来原来的估计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二月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后来，因国际上发生了波匈事件、国内右派进攻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又退回到原来搞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上去了。②从我党本身讲，我党自一九二一年建立以来，就处在长期的阶级斗争的旋涡当中，习惯于搞阶级斗争。搞阶级斗争是我们党的拿手好戏，在中国社会的特定的条件下，敌人武装到牙齿，老百姓形容旧中国社会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谁有枪、谁有兵权，谁的枪多，谁的权就大。毛选二卷里讲过，蒋介石把这个基本点抓得很紧，爱兵如命，谭延闿从来不当寡头省长，他当国民政府主席，还要兼第二军军长。我们党在长期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容易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新的情况和问题没有很好的进行认真分析，用原来的眼光看新问题。③胜利不断，一片颂扬，这就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届二中全会上发出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警告，但这时毛泽东同志自己骄傲了。原因是一个接着一个胜利，在国际上，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到莫斯科参加会议，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国内三大改造很快完成，敲锣打鼓地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一九四九年夺得全国政权，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胜利不断，毛泽东同志的威望空前提高，与日俱增，达到最高峰。毛泽东同志原来对苏联和民主人士有所顾忌，经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和莫斯科会议后逐渐丧失了清醒的头脑，他对苏联和民主人士不在话下了。参加莫斯科会议后，看到赫鲁晓夫不怎么样，对苏联不在话下。反右斗争后，对民主人士不那么顾忌了。如一九五八年二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批评了一个著名的民主人士清华大学的张奚若教授。张是中国人民外

交学会会长，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给我们党提意见，批评我们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毛泽东同志逐条进行批驳，说我们党正是这样，正是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功，正是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就是厚今薄古，有何不可呢？（参见郭老的《文史论集》11页，郭老参加了会议记载了它）这说明毛主席缺乏虚怀若谷接受批评的胸怀，人家提个意见很快给他打回去了。当然，这时应该指出，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还有很多好思想。这年七月在山东青岛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讲到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毛选五卷465页）时，强调要正确处理人民的内部矛盾，说这是总题目，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个意见最早是刘少奇同志提出的，毛泽东同志采用了。他还明确提出：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才算充分巩固。因此，当反右斗争结束，就宣布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去，表现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毛泽东同志主持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提出向自然界开战，向地球开战的问题。但是，毛泽东同志这时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却开始发生失误，如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开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人民内部伤害了许多不该伤害的人，划了五十多万右派。

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就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伤害了不少久经考验的好同志。一九五九年七至八月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前期，叫做神仙会，各种意见都可以提，纠正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左”倾错误，要压缩空气。庐山会议前柯庆施是与毛主席一起上庐山的。王任重问柯庆施，你与毛主席一起上山，毛主席说了什么没有，柯庆施回答，毛主席说：“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讲到陈云管经济工作管得好，一九五八年陈云没有管经济了，毛主席赞赏陈云同志是搞经济工作的内行。彭德怀同志上山后，七月十四日向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接到彭德怀信后，决定批判彭德怀。会议从七月十六日由纠“左”转为批右，作出了错误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当时刘澜涛的两个秘书编了个《马恩列斯论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见一九五九年《红旗》杂志）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批发了这个文件，题名为《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目前，此文件还是内部文件未发，其中一段话是：“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毛泽东同志把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看待是不对的，说彭德怀是“昔日的功臣，今日的祸首”。社会主义社会的党内矛盾，大都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革命同志之间的矛盾，是个是非问题，而不是敌我矛盾。毛泽东同志说彭德怀是“民主派”，“同路人”，这样评价彭德怀同志是不实事求是的，不公正的。当然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在此问题上彭德怀同志是对的。历史旧帐要实事求是的评价，是怎样就是怎样。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后，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还在发展。一九六二年九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了，认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当时估计国内外有八股逆流，即国外的帝、修、反、国内的地、富、反、坏、右。蒋介石还

叫嚣反攻大陆。当时把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也当成“单干风”反……。把彭德怀同志一九六二年“申诉书”说成是翻案。康生又在《刘志丹》小说上大做文章。十中全会上，康生用铅笔写了个条子送给毛泽东同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念了这个条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成了毛主席的语录，实际上是康生讲的，毛主席念了一下。此后就对习仲勋、刘景范同志立案进行审查。这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表现。

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是怎样形成的呢？一九六七年王力把毛主席上面两次会议上的两段话拼在一起，凑成一段语录，即是基本路线。这两段话都是毛主席讲过了的，只不过王力把顺序排了一下，但毛泽东同志未讲“始终”二字，“始终”是康生加的。列宁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两文中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就是消灭阶级，如果社会主义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那么怎么向共产主义过渡呢？那不等于说社会主义仍然不是社会主义吗？很明显，这与列宁的观点是矛盾的。以后把王力凑合的这段话，写进了九大党章报告，叫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成了党的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和各种“左”倾论点的理论基础。虽然是王力整理的，但写进九大党章是毛泽东同志认可的，还是能反映毛泽东同志当时思想的。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是以列宁在十月革命初期写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左派幼稚病》这两本著作作为依据。列宁的两篇文章是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的情况下，国内阶级斗争非常尖锐时写的，并不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写的。列宁说国际资产阶级存在，并不是说国际资产阶级存在就决定国内一定存在剥削阶级。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和以后的阶级斗争是两码事。一九六三年后毛泽东同志对阶级斗争估计越来越严重。毛泽东给陈正人蹲点的报告批示上，提出了“党内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以后又提出“党内走资派”的概念，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党的各级领导核心。他认为，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并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中央工作会上一再告诫全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对毛泽东同志来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了。不仅国际上要反对修正主义，在国内还要防止修正主义。

一九六六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更加系统化和完备化，表现在：①对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认为农村有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这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看法，有的人认为，不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估计有三分之二不在我们手里，在那里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工厂、企业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文艺界大多数是裴多菲俱乐部，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党政军中混进了大批的修正主义分子，中央的“走资派”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一旦时机成熟就要夺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5.16通知》的黑体字是毛主席加上去的。②毛泽东同志认为，过去我们搞了工厂、农村的斗争，还没有解决问题。一九六七年毛泽东同志在

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说，找到了一个形式揭露阴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把党内斗争公诸群众，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这个斗争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发表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前进》一文，集中反映了。这篇文章是北航红卫兵起草，由陈伯达、姚文元修改，送毛主席看了认可的。此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概括为六条。

“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左”倾理论的实践，“左”倾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指针。

党对“左”倾错误观点的发展过程的每一步都接受了它，并且把这一套“左”倾思想当作毛泽东同志的新的理论创造反复加以宣传，使相当多的党员和群众信以为真，以致这些“左”倾论点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难以进行辨别和抵制。因此，应该公正地说，“文化大革命”不止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错误，同时也是党的错误，虽然毛泽东同志作为这些“左”倾错误观点的首创者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应负主要责任。

2、组织原则的破坏，党内个人崇拜现象发展到个人专断作风的形成，这使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蔓延开来，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个人崇拜就是把领袖作为先知先觉的神。把群众看成是执行领袖意志的工具，是群盲，使党内思想处于僵化和半僵化状态，反正是领袖想好了，别人就不用想了。这也是因为我们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使我们党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认为我们的领袖是不会犯错误的。忘掉了七届二中全会规定的不准喊万岁，不准用人命地名，不准打致敬电共六条规定。把一切成绩都归功于毛泽东同志个人，个人崇拜风泛滥。由于毛泽东同志本人在胜利面前，颂扬声中逐渐骄傲起来，也就乐于接受这种个人崇拜。如：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成都会议上，毛主席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错误的个人崇拜。问题不在于崇拜，而在于是不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这种说法不对。个人崇拜本身不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在会上柯庆施推波助澜，说什么“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但会上却没有人批评柯庆施的谬论。随后这种谬论竟不胫而走。五月八届五中全会柯庆施由中央委员升为政治局委员。这样，制造个人崇拜既有理论依据，又得到组织赞赏，于是便愈演愈烈，越发不可收拾。长期以来，把毛泽东同志当成党的化身，真理的代表。林彪说“大树底下好乘凉”。毛泽东同志的话成了亿万群众共同遵守的信条和准则，人们只能以领袖的意见为转移。当领袖正确的时候还不觉得，当领袖犯错误的时候就发生问题了。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左”倾错误论点，能够被党的正式会议确认为党的指导方针，后来并被公认为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同个人崇拜的盛行是密切联系着的。如果没有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是搞不起来的。

个人崇拜使党的权力集中于个人，个人专断严重了。毛泽东同志说“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使个人一天天凌驾于党之上。一九五七年以前党的生活是正常的，一九五八年以后就不正常了。例如，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上，周恩来、陈云同志反对冒进是对的，毛泽东同志反反冒进是不对的。一九五六年的冒进表现在：①基建项目过大，原

计划600多个，后增至800多个；基建投资原计划112亿元，后增至147亿元。农业生产贪多求快，12年的任务要几年内完成，盲目推广双轮双铧犁，生产了183万部，结果一半卖不出去，大量积压。②国家原计划增加职工84万，后增至230多万，造成财政紧张，入不敷出，出现赤字，三材奇缺。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提议，《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发表题为《既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说明减少基建投资，农业生产量力而行等，这些执行起来效果很好。但毛泽东同志不满意这个社论，说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君子小人。引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不用全段话，是秦琼卖马，减头去尾，要中间一段，方法片面的，前面讲少数如何，后面讲多数如何。形式上是两面反，实为反“左”。一九五七年十月八届三中全会上，认为反冒进是一股风，反掉了农业纲要40条，认为反冒进是对一九五六年工作的否定。认为反冒进是方向路线错误，反冒进的同志离右派只有50米了。这种用批判、整人来统一党内思想的做法，是对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破坏，助长了家长制和一言堂。党内什么重大问题都是毛主席个人说了算，此后毛主席一般都不出席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开会讨论的问题要向毛主席汇报后才能决定。这样中央常委之间难以民主平等地讨论问题，毛泽东同志与政治局常委就不是平等的关系了。按照组织原则，党内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都有平等的表决权，少数服从多数。由于中央常委难以平等地讨论问题，毛泽东同志成了政治局的上级。一九六五年发展到不断指责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指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和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我不说是谁，大家去猜。当时许多人去猜，有的猜是北京市委和国家计委，都不对。一九六五年讨论23条时，刘少奇不同意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的提法，毛泽东同志用个人权威强行通过。毛泽东同志后来说，走资派有什么了不起，我只要扳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们打垮。一九七〇年毛泽东同志与斯诺谈话：我搞“文化大革命”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到“文化大革命”时，这种“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中央的集体领导，这是决议上讲的。

3、坏人利用。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左”倾错误。这些野心家采用的手段有三种：一是制造现代个人迷信，二是推波助澜，三是搞一个打倒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

制造个人迷信，始作俑者是康生。早在一九五八年康生在北京音乐堂给政治教员作报告时，就提出了“顶峰论”。一九六六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说，毛泽东思想准确说应当是“毛泽东主义”。（在七大讨论时毛泽东同志就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一九六〇年初，康生大讲特讲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最高最后标准，他贬低马列，规定中央党校先学毛主席著作，要先入为主。没有马列主义那有毛泽东思想呢？把提倡学习马列著作诬蔑为不学毛主席著作。

列宁讲领袖是一个集团，是复数，不是单数，是加了S的。康生在一九五九年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时，看到李大钊殉难的绞刑架，他训斥该馆是分庭抗礼，不突出红线。毛泽东同志常讲，“五四”时，李大钊、陈独秀是他的老师。当时李大钊是图书馆馆长，毛泽东同志是助理员，在其领导下工作。在康生的责难下，后来中国革命博物馆不

得不撤了李大钊的绞刑架,不展览了。康生就是现代造神家。林彪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主持军委工作,大肆宣扬高举、“紧跟”的口号,使现代造神运动风靡全国,对此毛泽东同志是尝识的。多次表扬林彪。毛泽东同志在一次同外宾谈话中,掏出了小红本说,我过去说话不灵了,现在灵了,就是林彪搞了一个语录本才灵的。林彪投其所好,使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左”倾论点能畅行无阻地成为全党的意志,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

江青别有用心地策划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前年在山东讲了《五·一六通知》剖析,在安徽省委党校也讲了,这里就不多讲了。

吴晗是专门研究《明实录》的,写过朱元璋传,是明史的专家,北京市副市长。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毛泽东同志看了湘戏《生死牌》(《三女抢板》),末尾出现了海瑞。毛泽东同志就把《明史·海瑞传》找来看,并给彭德怀同志看。提倡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乔木同志当时是书记处后补书记,管宣传工作,回北京后根据毛主席指示精神要吴晗写文章,吴晗写了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说现在没有新戏唱,要吴晗写一个海瑞的剧本,吴晗写了关于海瑞的剧本。(吴在北京读书时演过戏)吴晗同志与彭德怀本来没有什么关系。一个是元帅,一个是文人。江青硬要把他们拉在一起,说吴晗是为彭德怀鸣不平。先到北京找人写批吴晗的文章,没有人写,后到上海寻张春桥、姚文元一拍即合。(见安徽省委党校印讲稿)

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讨论关于海瑞罢官问题,(一九六四年夏天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付组长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周扬为组员,是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的五人小组。)会上彭真说,吴晗与彭德怀没有关系,批判应注意事实。《海瑞罢官》的问题应作为学术问题讨论。会后,由许立群、姚臻同志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于二月七日写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经过在京的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下发,二月八日,彭真率领五人小组向在武汉的毛泽东同志汇报。二月十八日作为文件下发。这时林彪和江青勾结在一起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搞了个纪要,即《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讲,要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支持她。林彪是部队的尊神,林有实权,江青有势,两人互相利用。《纪要》发表后,全面混乱。他们摸到了气候,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造舆论。

一九六六年三月下旬,康生到上海向毛主席汇报中日两党会谈情况,说中日两党联合公报已经商定,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坚持不点名批苏。(康生是书记处书记,主管国际联络工作)具体是刘少奇同志与日本共产党谈判,谈判的结果,刘少奇主持下的政治局常委讨论后表示同意了。毛泽东同志说,中央同意了,我可不同意,联合公报就不要发了。毛泽东同志也不接见宫本了。康生告状说,彭真于三月十一日通过许立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杨永直打电话,问上海发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康生说:“这是整到毛主席头上了”。毛泽东同志听后很生气说:为何吴晗发那么多反动文章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为何姚文元要打招呼呢?包庇反共知识分子就是大党阀,(指彭真同志包庇吴晗同志)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如果再包庇坏人,北京市委就要解散。还要彭真向上海市委赔礼道歉。(参看“文艺路线大事



记”）毛泽东同志批评后，四月九日至十二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康生传达毛主席以上的指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决定要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并决定撤销“二月提纲”。起草一个通知，康生要他的亲信王力来起草通知，宣布“二月提纲”作废。王力写了初稿，毛泽东同志认为太简单不能用，指示要陈伯达主持另搞一个。后来成立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等。这个组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通知草稿经毛主席亲自修改，据康生说毛主席修改了八次，提交四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当时，党内生活已不正常，尽管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结果还是按毛主席个人的意见通过了，后来又提到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五月十六日通过，简称《五·一六通知》。

在组织方面，林彪、江青采取卑劣手段搞了一个打倒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冤案。这就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并决定撤销五人领导小组，另成立一个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值得注意的是，陈伯达八月生病，中央专门发了个通知，在陈伯达生病住院期间由江青任文革第一付组长。这样中央文革的实权便操在江青手里。江青与陈伯达之间也有矛盾，她看不起陈伯达，常说陈伯达是一个刘盆子，就是傀儡。（东汉时赤眉、铜马起义，把刘盆子这个放牛娃娃弄出来，作为刘邦的后裔为皇帝）江青经常嘲讽陈伯达，说他象黎元洪一样，武昌起义时没有都督，从床下把黎元洪搞出来当了都督。陈伯达自己也经常说：“我又当了刘盆子”。我这里并不是减轻陈伯达的罪恶，而是说实权操在江青手里，因此，这次对陈伯达的判刑就轻一些。

打倒彭、罗、陆、杨，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就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组织上的准备；批《海瑞罢官》，炮制《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到一九六六年五月，组织和舆论准备都搞好了，发动“文化大革命”就势在必行了。

## （二）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为什么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介绍一些情况。

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二十六日在北京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七十六人。会议分成三个组进行讨论：党中央直属机关为一个组，军委系统为一个组，地方各省市自治区为一个组。会议由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东北师大编的讲义上说是毛主席主持的，毛主席当时在杭州，并未出席会议。但是必须指出，虽然是刘少奇同志主持的，但会议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四月在杭州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召开的，毛主席事先就把这个通知起草好了，提到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会议按照毛泽东同志四月在杭州会议的部署，主要讨论了三件事：

- 1、根据林彪、康生一伙的指控，罗织罪状，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同志作为反党集团进行批判斗争，并且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所担任的领导职务。彭真同志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在书记处彭真是二把手，仅次于邓小平同志，又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陆定一同志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罗瑞卿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杨